

六十年后说东归

—— 1946 年浙大由贵州复员杭州纪事

幸必达

一、话说当年

67 年前，浙江大学在全民奋起、共赴国难的抗日战争中西迁办学。竺可桢校长为了让大学向乡村传播科学文化，同时让师生深入农村唤起民众抗日，决定浙大不内迁西南的名都大邑，而选择走山区小县的流亡之路。转徙三年（1937—1940），经过浙江建德、江西泰和、广西宜山，最后定居遵义，在遵义、湄潭、永兴三地一住七年。竺校长肩挑战时大学教育与科研的双重任务，领导师生们在破庙茅屋中，布衣蔬食，弦歌不辍，以独特的办学精神和尖端的科技成果蜚声国际，被誉为“东方剑桥”，树立起一面战时流亡大学崭新的办学旗帜，浙江大学也从艰难中崛起。当年办学困苦，至今犹历历在目。

1945 年，抗日战争胜利了。在全国人民的欢欣鼓舞声中，浙江大学也胜利复员。师生们怀着对遵义人民的无限感激与眷念之情，从 1946 年夏天开始，经过 5 个多月的艰难转徙，全校才东归杭州。这次复员人数众多，是一次庞大的转运工程。

当时，内迁云、贵、川三省的高校师生员工眷属数万，加上政府机关单位人员眷属不下数十万，在海陆空运工具十分缺少的情况下，竺校长带领执事人员四处奔波，北上重庆，南下贵阳，东去南京、上海、杭州，风

雨兼程，为复员规划行程，寻找联系工具、经费及重建校舍，向教育部要复员费、建校费，向交通部、公路局、两航飞机和民生轮船公司联系工具，真是艰苦备尝，席不暇暖。在万分困难中决定了分期分批复员的总方针。浙大遵义总部改为留守处，由王国松院长主持。6月1日以后函电公文均转杭州，5月份正式启动复员工程。

从1946年5月7日第一批三辆汽车先行，到10月10日杭州庆祝胜利复员大会，历时150余天，师生员工眷属3000余人和图书仪器数百箱安全回到西子湖畔。竺校长和执事人员可谓心力交瘁，实在令人感泣。

2006年，距浙大复员东归已经整整六十年了，竺校长和很多老师、学生都已先后去世，在世的师生都已苍颜白发，年登耄耋。回首往事，喜悦中也饱含辛酸。今天，祖国强大了，经济腾飞，交通四通八达，比起当年东归条件真有天壤之别。浙江大学也已发展成为世界知名大学。抚今追昔，我们更加怀念为国操劳、为科学和教育鞠躬尽瘁的竺校长。这段艰辛的历史，我们很难忘记，也应该借此段历史告诉我们的青年朋友们：请珍惜今天的幸福日子！

二、艰难的壮举

1946年2月9日，浙大在湄潭召开第一次复员预备会，匡计复员人数为3000人左右，按当时物价预计复员费为3.74亿元法币（下同）。2月25日，教育部在重庆召开的高校复员会议，决定复员次序为离重庆近的先迁，远的后迁。当时交通情况，据《竺可桢日记》记载是：水运走长江，民生公司有轮船96条，但领港员只有46人，不能全用，每月可运1.8万至2.4万人；陆运走川、黔、湘方向去长沙，接铁路到武汉再转长江水运；公路有汽车600辆，每月能运1.5万人；空运有央航和中航两公司，有飞机23架，每月可运4000人，但规定每校每月只配给机票3张。无论水陆运输，都要自己联系车船。

因川江水运已拥挤不堪，便让重庆附近学校先走，浙大只能考虑陆运，即经贵阳去长沙、武汉再转水运了。4月26日，浙大行政会决定，根据教育部发来的复员费3.7亿元，分配到人。其中：学生每人复员旅费9.5万，

加 5、6、7 三个月的公费共发 12 万；研究生每人复员费 9.9 万，加三个月公费共发 12.9 万；教授每人 15 万、副教授 14 万、讲师 13 万、助教及职员各 12 万，家属妻子与丈夫同，子女及佣人各 10 万，佣人家属 5 万。学校决定 5 月 5 日在遵义举行当年的毕业典礼。领款的师生员工可以自找交通工具先走。

当时，学生代表向学校反映，每人 12 万元旅费不够用。学校限于经费无法增加，同意无家可归和无钱可借的师生暂留贵州，候至 9、10 月间与学校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同行，车船均可免费。因杭州校舍未修复，先走的人可以先回原籍家中。学校决定 11 月学生开学再到校复课。

决定公布后，能走的师生员工都各自找车出发，湄潭、永兴师生都逐渐集中到遵义找车。当时很少有正规班车，很多人都找司机搭便车，当了“黄鱼”，真是归心似箭。先后走了两千多人后，剩下的都是无家在江浙的学生或家累很重的老师和职员，大家都决定随校最后迁走。

8 月中旬，学校联系了陆军交警二团，以一百辆军用十轮大卡车为浙大运送全部留黔人员和物资。学校紧急征募一百名学生担任无偿的押运人员，负责押运物资和照顾同行老师员工眷属。应征的人很踊跃，笔者当年是四年级学生，也是应征人员之一，亲历了这次东归旅程。

三、陆路行程

1946 年 9 月 4 日上午，我们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准备出发。一百辆十轮大卡排列在子弹库校本部广场上，已经装车待发，蔚为壮观。押运同学先期已开过会，自动推举了一批负责人，商定了九条公约，要求大家遵守：

1. 车队统一出发，保证一路同行，经贵阳直驶长沙，到长沙接待站交卸物资为止。

2. 同行老师及员工子女眷属优先坐驾驶室，其余人员及物资统安在车厢。

3. 乘车人员每人先交一万元作途中生活费用，沿途集体办伙食；负责办伙食的同学先采购一些大米、干菜、腊肉等装车备用；估计行程六天，早、中、晚都统一用餐。

4. 每天到站后住宿都尽量借住学校、庙宇，以省宿费。

5. 每天到站后由负责住宿的同学安排住处，负责伙食的同学（以女同学为主）上街买菜和下厨做饭，统一进餐。

6. 晚上买蜡烛分发各处照明。

7. 黎明即起，统一早餐后上路，中午在途中饭店就餐。

8. 车抵长沙前结算伙食账，多退少补。

9. 互助互让，同甘共苦，照顾好老师及老幼眷属，服从统一指挥，争取平安到达。大家一致同意。

经过组织，队伍有条不紊地出发了。百辆大车浩浩荡荡离开遵义，我们含泪向夹道相送的遵义人民挥手告别。

第一天宿贵阳，我们借住豫章中学校舍，学校领导热情支持，借给我们几间大教室和厨房，做饭、住宿都很顺利。第二天早饭后上路，当晚宿黄平。第三天宿玉屏，已到贵州边界。第四天宿芷江。湖南道路平坦，又逢天气晴朗，“秋山红叶，老圃黄花”，师生一路谈笑风生，驾驶员十分尽职，车辆没出过问题。第五天到黔阳，过沅江大桥时，浮桥过渡要排队，百辆车队过了不少时间才过完，晚上只能宿洞口。第六天中午就到了邵阳，这里距长沙已经不远，负责伙食的同学公布账目，颇有结余。大家同意在邵阳大饭店聚餐，一是庆祝陆路行军的首战告捷，二是借此向驾驶员们的辛勤表示感谢。我们抓紧赶制了一百幅简易的“锦旗”（实际上只是一百块白大绸），每面中央由胡哲敷教授书写“今之王良”四个隶书大字，四面有全体师生的签名，在餐会上隆重赠送给每一位驾驶员。大家高唱校歌，欢声雷动，餐后直驶长沙。

长沙接待站由舒鸿教授主持。车辆全部卸货，我们交清了物资并卸下各人行李。接待站为我们向救济总署（全称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）领取了每人一张的难民证，凭证可享受免费车船和食宿供应直到杭州。当天，我们就搭上火车直驶武汉，候船东下了。

四、水路行程

在武昌下车，难民站安排我们住进一座日寇占据过的大仓库。高大的木质楼房，已住进不少难民。睡的是地铺，一间几十人，没有电灯，照明

用蜡烛。

蚊子臭虫特多，晚上很难入睡。白天一日两餐，排队打饭，有酸菜和军用罐头牛肉佐餐，虽然不太可口，但大家都知足了。

住下来是为了候船。我们每天都去黄鹤楼下守候，但候了十来天，船还是杳无踪影。白天好过，夜晚难熬，我们饱尝“望穿秋水”的滋味。

汉口在武昌对面，只一江之隔，有小船摆渡。一次偶然的机，我们去汉口观光。这里有十里洋场，商业繁华，沿江大道车水马龙，比武昌热闹多了。

浏览中碰到早来汉口的同学，他们住在复员招待所。这里是接待政府复员人员的，已到秋天，政府复员的人已经不多，招待所基本空着。管理人员听说我们是浙大师生，欢迎我们免费入住，我们很快搬了过来。这里每间房里有六个床位，有凉席、棉毯和蚊帐，清洁整齐，电灯明亮，还有洗澡设备；晚上可在花园里乘凉听音乐，比起在武昌当难民，真有天壤之别。我们是离苦海上天堂了。但这里不供应伙食，也无法自己开伙，只能上街买吃的。我们多数人带钱不多，最初还能上小店吃客饭，后来只能买烧饼、油条充饥了。有的每天还只敢吃一顿，只盼难民船早些到来。

大约十来天过了，难民站通知说船来了，来船是美军登陆艇“绥远”号，载重六千吨，只载复员上海的大学师生。上船后才知道有浙大（约三百余人）、东方语专（二百余人）、艺专（一百余人），共计师生七百余人。一个大统舱，我们协商分配，男女老幼分成几大片铺好床位住下了。船上有淋浴室，有高压消毒饮水供应。每日两餐供应牛奶、面包和一小罐牛肉，都是军用剩余物资。大家都是劫后余生，又一次安下心来，真有限感慨。船长是美国人，和大学师生友好相处。他们是根据租借法案来中国开展救济工作的。

当天起锚东下，晚上船靠九江。我们三校师生联合，在船上组织了一次联欢晚会。宽阔的甲板上灯火通明。各校节目有古琴、琵琶、南胡独奏、抗战歌曲大合唱、轮唱、女声独唱和舞蹈等，丰富多彩。师生和外籍船员同乐，岸上也有不少观众，直至午夜方罢。第二天船靠安徽芜湖，夜色中不少人下船观光，游夜市。第三天船到南京浦口，接待站有车来接，下船后再上火车，当天抵达杭州。这时已是9月下旬，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，

历时二十余天，总算安全抵达杭州，回到母校怀抱了。

五、开学之前

八年艰苦抗战，日寇已将浙大在杭州的校舍破坏得面目全非了。大学路本部和华家池校舍都被日机炸毁，到处都是瓦砾和残垣断壁。学校因陋就简修复了部分平房，正开工兴建新校舍。我们来早了，又不像江浙同学可以回家，学校安排我们暂时住在浙江图书馆楼下的大厅里，伙食、照明都得自己设法解决。

救济总署收缴难民证时，发给每人一袋面粉（50斤），另有一些罐头牛肉之类的军用剩余物资。面粉已经发霉，我们只好贱价卖掉，换些大米、油盐。同学们又组织起来自己开伙。电灯是自己安装的，图书馆外是瓦砾场，到处有被炸断的水管。先到的人已用木楔堵塞管口，随时可取水来洗脸、洗澡。晚上行人稀少，可以利用水管淋浴，凉水冲洗后沁人心脾，可以安然入睡。我们算是安定下来了。10月12日起，学生救济总会为浙大贫苦学生办起了免费食堂，有300个名额，经批准的清寒学生每月交5千元柴火费，可以到食堂就餐。我们自办的伙食团自动解散了。

学校11月1日开学，恢复了公费待遇，食宿都已安排就绪，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。

时间过去了整整六十年（1946—2006），东归旅程经过回忆，还能记下一些主要情节，说明了这段历史对我有着难忘的印象。文中遗漏和错误之处，还希望当年同行的老师和同学加以纠正和补充。

浙大西迁和复员，都是竺可桢校长亲自领导的。回忆当年的流亡岁月，我们更加怀念逝去的老校长，也怀念当年辛苦育人的老师们和风雨同舟、流离转徙的学长们。在举步艰难、山河破碎的年月，我们曾经不屈不挠、共渡难关，这是一段多么珍贵的回忆。八年抗战，六十年奋斗，祖国人民不畏艰难，重建家园，再造辉煌，幸福的日子来之不易啊！愿我辈在桑榆晚景中继续弘扬求是精神，祝愿母校和祖国更加繁荣昌盛，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。

六十年后说东归

(作者系浙江大学 20 世纪 40 年代毕业生, 今年 95 岁)

此文定稿于 2006 年 5 月

“一座名城，两迎长征”

曾祥铤

“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”马克思 1848 年 2 月 22 日在布鲁塞尔演说的这一开场句，早已成为广为引用的经典名言。言及浙江大学西迁遵义、湄潭，往往让人联想到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遵义的情景。以遵义为切入点，两者确有一些“惊人的相似之处”。

中央红军 1934 年 10 月由江西、福建出发西进，途经湖南、广东、广西三省，1935 年 1 月占领遵义，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，一度准备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苏区。迁至江西的浙江大学，1938 年 9 月从江西西进，也同样经湖南、广东、广西三省，于 1940 年 1 月抵达遵义，在遵义、湄潭办学达 7 年之久。经由相同的路线，抵达遵的时间都是 1 月。前后相距 5 年，遵义城皆以满腔热忱迎接了这一武一文两支振兴国家民族之师，可谓“一座名城，两迎长征”。

《遵义——浙大西迁大本营》是介绍当年浙大西迁遵义情况的历史资料，此文以此为中心话题。

1937 年 7 月 7 日，日寇进袭卢沟桥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8 月，日机开始轰炸杭州。11 月，日军在距杭州百余公里的全公亭登陆。在轰炸中仍坚持上课 3 个月的浙大，被迫踏上西迁征途。

短短两年多时间里，立足未稳，敌机又至，不得不一再迁徙：一迁浙西天目山、建德，再迁江西吉安、泰和，三迁广西宜山，四迁贵州遵义、湄潭。

1940 年 1 月到达遵义，2 月即开始上课；5 月湄潭分部校舍落实；12 月湄潭永兴可接纳学生。1940 年底大体安定下来，总体布局是：校本部及

文学院、工学院、师范学院文组在遵义；校分部及理学院、农学院、师范学院理组在湄潭；一年级在湄潭永兴（此前一年级暂设贵阳青岩）；1939年4月始设于浙江龙泉的分校，其学生读过一年级后也转到遵义、湄潭继续学业。

西迁途中，浙大师生及教职工家属颠沛流离，备尝艰辛，有的还被疾病夺去生命，其中包括竺可桢校长的妻子与次子。到了遵义、湄潭，物质条件依然较为困难，但1940年2月至1946年6月，在遵、湄的这7年间，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与治学环境。1989年11月，时任浙大校长的路甬祥教授在《浙江大学在遵义》一书的“序”中说：“人民养育了浙大，遵义、湄潭是浙江大学的第二故乡。”

遵、湄办学期间，浙大有了巨大的发展。西迁前的1937年10月，浙大仅有文理、工、农3学院16学系，学生633人。随校西迁学生460人。西迁中，逐年发展。至遵、湄迁返杭州前夕，已有7学院，27学系、4研究所5学部、1研究室，1分校，2先修班，1附属中学，工场11所，农场有地300亩。在校大学生，1941年6月为1486人，1946年10月为2243人。

浙大在遵、湄办学，为国家和民族保全了一大批科学家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大量优秀科学技术人才。1944年，浙大全校教职工420人，其中教授、副教授144人，讲师38人，助教110人。在遵、湄时期的毕业生合计1857人。上述绝大多数师生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国家经济和科教文化战线上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的贡献。据1989年统计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，有27人曾在浙大任教，40人为浙大毕业生，67人中80%以上在遵、湄工作和学习过，照一些浙大校友的说法，他们吃过遵义的米，喝过湄江的水。

遵、湄办学期间，竺可桢校长在宜山时提出的“求是”校训得以认真贯彻、实践。他说，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、牺牲精神、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。求是之风遍及浙大，惠及遵、湄。在此风气熏陶下，浙大师生严谨治学，科研成果累累，爱国热情高涨，使浙大获得“东方剑桥”“民主堡垒”的美誉。

遵、湄办学期间，浙大对遵义地区经济、社会的发展，有了极大的推动作用，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。遵义属贵州较为发达的地区，就全国而言，当时依然相对闭塞，较为落后。浙大带来了现代科技文明，开阔了人

们的眼界，推动了科学知识的普及。浙大在遵、湄帮助培训师资，编写辅导期刊，在中、小学兼课等，有力地推动了遵义地区教育的发展。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，从多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，如农作物与蔬菜的栽培，病虫害的防治，五倍子的研究，锰矿的发现……至今依然发挥作用。社会科学方面，《遵义新志》《播州杨保考》等著作，开辟了遵义地域文化研究的新途径，现在仍有指导意义。抗战期间，遵义地区经济、社会发展水平，整体上有了相当的提升，浙大的影响即为重要因素之一。

浙大西迁，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壮举，是遵义历史文化中的光辉篇章之一，丰富的蕴涵有待我们不断发掘，对这一宝贵遗产，我们将倍加珍惜。

遵义，在 20 世纪 30、40 年代，有幸经历两次长征的洗礼，长征精神与求是精神都已融入遵义的革命传统之中，将永远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。

2011 年 3 月